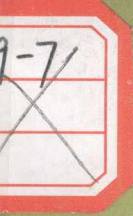


重庆 • 1978—1988

地方史论著

目录

● ●
重 孟



重庆·1978—1988

地方史论著

目
录



重庆地方资料丛刊

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
(1978—1988)

孟广涵 主编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重庆出版社

1989年·重庆

例 言

一、本目录收录 1978—1988年 出版发表的关于重庆地方通史和专门史的专著、论文和资料篇目，反映了学术界对1949年以前的重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人物等方面研究的状况。有关解放后重庆历史的条目只占极少部分。全书共计专著187条，论文、资料4130条。

二、本目录采用分类主题编排法。按条目主题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和通史部分，下编为各专门史和人物传记，计10个大类，38个主题。

专著列于上编各大类之首，按专著内容的时间顺序排列。

论文、资料原则上在按笔画笔形排列的前提下，将部分同一内容的条目适当集中。

人物传记按被传人的姓氏笔画笔形排列。人物下的条目，按其字头笔画笔形排列。

三、本目录的条目按下列顺序注录：篇(书)名、著译编者、出处、时间、卷期。

四、为了方便检索，本目录书前设分类纲目，书后附《收录报刊一览表》。

五、如有按其主题内容，可同时归入两个类目的条目，按条目主要主题内容归类排列。

前 言

孟 广 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根据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要求，重庆地方史研究工作逐步发展起来，取得了很大进展。

为了检阅十年来重庆地方史研究成绩，交流经验，提供信息，并从中找出研究工作上的薄弱环节，以便进一步推动重庆地方史研究的开展；同时，为便于重庆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和国内外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检索重庆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这本《重庆地方史论著目录（1978—1988）》。

这本《目录》系从全国 250 余家出版社和刊物、报纸中收集、整理而成，反映了我市和省内外历史学界对重庆地方史的研究成果，计专书 187 部，论文、资料 4130 篇。十年来重庆在地方史研究方面取得这样多的成果，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也是成绩最为显著的单位之一。

地方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既是一门基础学科，又是一门应用学科和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带有区域特殊性的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

研究地方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述往事，思未来”，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正确地

认识国情。国情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有实在内容的，省情、市情是国情的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不仅地理环境、民族风情不同，而且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进程也有差异，各具特点。全面深入地研究地方史，认清各地历史发展的不同过程、特点和规律，才能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制订自己的发展规划和实施办法。

如果说地方史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那么城市史的研究，在我国则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是一个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人口的结合体，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信息中心，它集中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资金，大量的科学文化设施，大量的各种人才和劳动力。也就是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了很大的生产力。它不仅是一个中心，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同时，它也集中了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对城市，特别是近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从经济与政治、文化教育，人口风俗，社会结构，功能大小，优势劣势，地理环境等各方进行研究，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和预测它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方向，就会为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更好地发挥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提供必要的历史依据和借鉴；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材。这些作用，是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所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对城市史的研究，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重庆是内陆大城市，也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它曾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过巨大作用，现在仍然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所以，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中，近代城市史研究被列为重点科研课题，并把重庆定为第一批开展这一工作的四大城市（上海、天津、武汉、重庆）之一，旨在研究重庆在近代时期的兴

起和发展,探讨它和其他大城市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它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

十年来,重庆地方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研究工作还处于收集、整理、编纂资料和初步研究的阶段。历史资料浩如烟海,收集、整理资料的任务既繁重,但也不能逾越;没有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也就无法进行深入研究。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从已经收集、整理出来的纷繁复杂的资料中,研究出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还会向我们提出更多的新的课题。因而,这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面对这一繁重而长期的任务,我们地方史学工作者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学术讨论上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对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所占据的资料必须是真实的。真实性是地方史研究的灵魂和生命。只有真实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发展的概貌和规律,才能起到历史的借鉴作用,才有科学价值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们重庆的地方史学工作者,在过去的十年中,走过了一段艰辛的道路。在未来的十年中,我们一定要不断开拓前进,在地方史学的百花园里迎来又一个绚丽的春天!

参加本书资料收集和编辑工作的有周勇、饶亚、王令、陶志刚、秦文敏等同志。初稿编出后,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地方志总编室、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图书馆、重庆市档案馆的同志,或在资料收集,或在编排体例,或者校勘考订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我们深表感谢。但是由于时间仓卒和我们水

平有限，资料收集必有遗漏，编辑分类容有不当，恳切期望历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不吝赐教，多多提出批评、指正。

1989年1月

十年来的重庆地方史研究

周永林 周 勇 饶 亚

一 主要进展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曾经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因此，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地方史（包括通史和党史），特别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以其独特的风貌而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

在历经曲折坎坷之后，重庆地方史研究才得以重新起步、开拓并开始走向繁荣。在1978—1988年的十年中，取得一系列重要的进展。

——以研究重庆地方史为主要任务的研究机构相继重建和建立，并已初具规模。1978年，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率先重建。随后，市委党史工委（1983年）、市政府地方志编委会（1986年）也相继建立。西师、重师、市党校的历史、党史教研部门，也建立了专门机构。市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也将地方史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之一。一些外地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也建有专门研究重庆的组织，重庆地方史学者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建立了以老专家、老学者带头，以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为骨干的重庆地方史专兼职研究队伍。老学者青春焕发，老当益壮，硕果累累，甘为人梯。更为可喜的是近年来一大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脱颖而出。他们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勤于钻研，虚心好学，

显示了年轻史学工作者的朝气和潜在实力。

——创办了一批以发表重庆地方史研究成果为主旨，并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学术刊物：《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重庆党史研究资料》、《南方局党史资料》、《重庆地方志》、《重庆文史资料》等；并蕴酿创办新的刊物。

——发表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内容涉及重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出版了专著、文集、资料187部，论文、资料、人物传记4130篇。其中研究重庆通史的1440篇(部)，占34.87%；研究专史的1050篇(部)，占25.42%；研究人物的1450篇，占35.11%。其它190篇，占4.60%。

——形成了重庆地方史研究的带头课题。在这一大批学术成果中，尤以古代时期的巴史研究，近代时期的重庆开埠史、重庆城市史研究，现代时期重庆建党史、第二次国共合作史、南方局党史、抗战时期重庆及西南经济史的研究，成绩最为突出，进到了该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在国内外学术界均获得较高评价。有的已被列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或国家级重点项目。

——为重庆市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多次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嘉奖和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据不完全统计，在已进行的三次四川省和两次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活动中，计有《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系列丛书中的《重庆谈判纪实》和《国民参政会纪实》、《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巴史新考》、《重庆开埠史》、《辛亥革命重庆纪事》以及《重庆市情》、《重庆年鉴》等30余部(篇)著作，获得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府授予的优秀成果奖。还有一大批著作，获各机关、学校、学会授予的各种奖励。有的还列为国家对外交流学术著作。由于重庆地方史学界作了大量的基础工作，198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重庆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

面对这4000余件成果，应该说，不论是成果的数量，或是研究的范围，重庆与全国其它大城市相比，已走在了地方史研究的前列，在某些研究领域里，已达到了本学科目前的较高水平。在回顾十年历程，展望未来十年的时候，我们认为，尽管十年风雨，举步维艰，研究工作还存在许多空白、弱点和缺点，还不能尽如人意，但重庆地方史学界的同志们可以说，我们无愧于这改革、开放的十年，无愧于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

二 关于重庆古代史研究

重庆古代史研究由于有一批老学者的长期耕耘，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十年来又有一些突出进展和成绩。

（一）巴史研究

巴蜀史研究是近十年来四川古代史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相继出版了一批专著，如董其祥著《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童恩正著《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邓少琴著《巴蜀史稿》（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6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同时还发表了一大批论文。它们论述了巴氏族和巴国的形成、发展、演变，以及巴族与蜀、楚、越、羌、秦、彝的关系，对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

（二）钓鱼城研究

钓鱼城研究是重庆古代史上的又一热点，论文不少。1981年在合川召开了全国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出版了《钓鱼城历史学

术讨论会论文资料集》(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川县历史学会编,1982年)。不久又出版了唐唯目著《钓鱼城志》(重庆出版社,1983年)。这些论著对钓鱼城——重庆——四川在南宋末年抗元斗争中的历史地位、人物评价等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展示了史学界关于钓鱼城之战及相关问题的主要成果和资料方面的新进展。特别是披露了一些珍贵史料。

(三) 农民领袖研究

1982年,在江北区发掘出土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明玉珍墓(叟陵),特别是其中“玄宫之碑”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发表了一批论著。最有代表性的是汇集了重庆市博物馆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文集《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2年),这些论著对明玉珍生平和他所创建大夏国的史实、历史地位、与其他政权的关系等作了全面的研究。而对明玉珍墓葬的研究,则在元、明时期的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获得了新的认识。同时,对明玉珍、明升、大夏政权史料的收集,也是一个推动。

王纲编《大西农民军五次攻克重庆始末》(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1年)一书,再现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率领大西军转战四川,五次攻克重庆,沉重打击明清统治者的历程。该书并辑录了地方志中的有关史料,介绍了现存的有关文物。

(四) 文物考古

十年来,作为重庆地方史研究重要一翼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首先,开展并完成了我市的文物普查工作。从1985—1987年,我市数千名专业人员和基层干部,踏勘了90%以上的乡村和街道,调查、测绘、记录了7000余处文物点,其中古遗址235处,古墓葬

3507处，古建筑1067处，石窟寺及石刻818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746处，其他文物590处。由于这项规模宏大的工作的开展，从而弄清了我市文物的基本状况，积累了一大批历史文献无法替代的珍贵实物资料。在此基础上，重庆市博物馆将编辑出版《重庆文物总录》。

其次，在田野考古方面发掘了大批与地方史关系密切的珍贵文物。如1982年发掘了临江支路西汉墓群，其中三号墓就出土近千件殉葬品，在我市出土的西汉墓中首屈一指，可能是巴郡郡级官吏或其宗属之墓。同年，在江北聚贤岩出土了汉代“偏将军印章”，金质龟纽，重100余克，可能为东汉光武十二年七月拔江州（今重庆）后，公孙述部将田戎在败亡中所遗。田野考古的另一重大进展是对南岸涂山宋代黑釉瓷窑的五次发掘，出土文物标本6000余件，基本摸清了这一地区历两宋300余年星罗棋布的民间窑场的规模、工艺特点，以及重庆地区的商品生产情况。明玉珍墓的发掘出土，也是这10年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事件。

第三，重庆文物考古学界的大量工作，为争取我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五）其 他

邓少琴等著《重庆简史和沿革》（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1年），彭伯通著《古城重庆》（重庆出版社，1981年），概述了三千年来的重庆的发展历史（主要是古代史），对重庆的地理沿革、建置始末、地名街道、名胜古迹等作了大量考证和论述，具有较大影响。刘长久等编《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收集了有关大足石刻的研究文选，以及《大足石刻志略》校注和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等资料。吴蓉章等编《大足石刻之乡的传说》（重庆出版社，1986年），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对大足石刻作了简略的介绍。

彭伯通编《重庆题咏录》(重庆出版社, 1985年), 辑录了唐至近代咏重庆的700余首诗歌。王秉诚的《重庆掌故》(重庆出版社, 1986年), 许可、游仲文的《重庆古今谈》(重庆出版社, 1984年), 生动地记述了重庆历史上的轶闻趣事、名胜古迹。

三 关于重庆近代史研究

与重庆古代史相比, 1978年时, 重庆近代史研究的基础甚为薄弱。仅在教案等某些点上有所涉及, 大多数领域里是一片空白。正因如此, 十年来的进展甚为显著。

(一) 重庆近代历史的整体研究

隗瀛涛等著《重庆开埠史稿》(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1982年)、《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 1983年), 邓少琴著《近代川江航运简史》(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1982年), 周勇等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年), 这三部通史和专史相结合的著作, 以帝国主义强迫重庆开埠, 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侵略为基本线索, 着重阐述了近代史上重庆的政权演变、经济发展、阶级关系、民族矛盾、文化融合、社会更替、习俗演变。由于这种整体研究的开展, 从而大体理清了重庆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为整个重庆近代历史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为以重庆历史为对象的第一个国家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的确立, 作了重要的学术准备。

(二) 重庆辛亥革命史研究

重庆辛亥革命史是十年来重庆近代史研究领域里取得较大成果, 并逐渐赶上全国研究水平的一个领域。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时候，重庆市政协等单位召开学术讨论会，并编印了《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等专书，发表了一批论文，对重庆蜀军政府及其领导人杨庶堪、张培爵作了初步研究。

以那次会议为契机，不少学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这一尚未开发的领域。其集中的体现是1986年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时出版了周勇著《辛亥革命重庆纪事》（重庆出版社，1986年），和重庆地方志编委会等单位编著的《重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两部著作，以及在此前后发表的一批文章。这些论著在广阔的近代重庆历史背景下，深入考察了重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探讨了重庆辛亥革命的特点，以及与四川、中国近代历史的关系，并对其主要领导人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对重庆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些具体史实作了进一步考证，开始对一些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并涉及各县的反正起义；对辛亥以后二次革命及护国、护法战争的历史也有所论述。

（三）邹容和杨庶堪、张培爵研究

邹容是生长于重庆，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独领风骚的青年革命宣传家，因此，十年来，重庆史学界对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85年，四川省和重庆市联合召开了纪念邹容诞辰100周年大会，出版了《论邹容》（廖伯康等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在此前后，还出版了隗瀛涛著《邹容》（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宋兴华等的《邹容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陈旭麓著《邹容和陈天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冯祖贻著《邹容、陈天华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等著作，发表了近70篇论文。这些论著有的从宏观纵向深入考察了邹容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更从横向研究了邹容与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关系；有的既研

究邹容的思想及其渊源，又研究了她的独特性格及其社会原因，有的对邹容生平及其家庭进行了多方考证。

杨庶堪和张培爵是重庆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十年来，对他们的生平均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发掘了一批有关他们的资料，出版了马宣伟的《杨庶堪传》（巴蜀书社，1988年）。

（四）大足教案及余栋臣研究

大足教案及余栋臣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的热门课题。1982年，在大足召开的反洋教运动和余栋臣起义学术讨论会，对余栋臣起义的原因、社会背景、口号、性质，与哥老会的关系，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川东教案与余栋臣起义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并对余栋臣进行了评价。这次会议既检阅了研究成果，又推动了教案——反洋教斗争史的研究。1987年，出版了胡齐畏著《大足人民反洋教斗争》（大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集中收集和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几年来，重庆近代史学界在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学者的交流中收集了一批珍贵史料，如日本外交官竹添进一郎1876年游历四川、重庆的日记《栈云峡雨日记》（1878年东京版）、英国商人立德乐从事川江航运贸易的专著《通过扬子江三峡》（1898年伦敦版），以及法国传教士华芳济关于大足教案的回忆等。

四 关于重庆现代史研究

如果说，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重庆地方史研究，在古代史领域里多少还有一些基础，需要更进一步加深，在近代史领域里基础相当薄弱，需要新建体系的话；那么，在现代史领域里，我们面对的就不仅是相当薄弱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有大大小小的禁区，和作者与读者在框框禁锢下的思想。然而，十

年来，在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大潮中，和全国现代史、党史学界一起，重庆地方史学界的同志们不断地突破研究禁区，开拓研究领域。在回顾十年历史的时候，可以说，重庆现代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已基本完成，研究领域也大体齐备，我们所面临的已是一个尽管仍需艰苦工作，但已充满希望的局面。

（一）重庆五四时期研究

关于“五四”时期的历史，重庆市党史工委编印的《五四运动在重庆》，反映了重庆五四运动、留法勤工俭学、新文化运动的概况，反映了这一时期重庆历史的特点。

（二）大革命时期重庆史研究

对大革命时期重庆历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9年3月，重庆市政协等单位举行纪念“三·三一”惨案暨杨闇公烈士牺牲52周年座谈会，省市领导祭扫杨闇公烈士墓，杨绍中、周永林、李畅培编辑整理了《杨闇公日记》、《回忆杨闇公同志》（均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两书。邓小平同志为《日记》题写了书名。以此为契机，揭开了重新研究大革命时期历史的序幕。此后陆续出版了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的《大革命时期的重庆》，它对重庆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四川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重庆的兴起、高潮、曲折和失败，以及重庆地委和泸顺起义进行了研究，成绩卓著。陈石平著《泸州顺庆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四川省委党史工委的《泸顺起义》（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以及一批论文，对重庆地委的建立，组织机构，基本活动，特别是它领导的泸顺起义作了详细全面的考察，从而展现出这次武装起义的全貌，揭示了它在党史、军史上的重要地位。

1987年，为纪念“三·三一”惨案60周年，四川省和重庆市联合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其间，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等单位召开了学术